

梅之辑

王晓平 主编

远传的衣钵

王晓平 著

日本传统的敦煌佛教文学

人

文

日

本

新

书



宁夏人民出版社

王晓平 著

元
传的
衣钵

——日本传统的敦煌佛敎文学

宁夏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远传的衣钵：日本传衍的敦煌佛教文学 / 王晓平著. —银川：
宁夏人民出版社，2005. 5

(人文日本新书 / 王晓平主编)

ISBN 7-227-02929-8

I. 远... II. 王... III. 佛教—宗教文学—文学研究—日本
IV. I313. 9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5) 第032337号

远传的衣钵——日本传衍的敦煌佛教文学

王晓平 著

责任编辑 高 伟 哈若蕙

装帧设计 吴海燕 【小狼工作室：0951-5012113】

责任印制 樊建强

印刷装订 宁夏施尔福印刷有限公司

宁夏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地 址 银川市北京东路139号出版大厦

邮购电话 0951-5044614 5045311

邮 编 750001

网 址 www.nx-cb.com

电子信箱 nrs@public.yc.nx.cn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880×1230mm 1/24

印 张 9.75

字 数 150千

版 次 2005年6月第1版

印 次 2005年6月第1次印刷

印 数 0001-3000册

书 号 ISBN 7-227-02929-8/I·750

定 价 38.00元

版权所有 翻版必究

大型文化学术类图书——『人文日本新书』

关注人文日本 介绍日本文化 体现中日文化交往的历史
凸显原创 规模宏大 题材广泛 立论严谨 内涵深刻

梅之辑

中日文化文学关系

樱之辑

日本文学

松之辑

日本宗教 风俗 历史

竹之辑

日本艺术

佛教文学在中日文化交流中发挥过特殊重要的作用。被中国文学遗忘的文体——愿文，在日本发展成为哀伤的抒情文学，其影响一直延续至今，而中国传统中主宰寿夭的泰山府君，传到日本成了阴阳师中安邦护国延寿授禄的祭祀对象，在古典戏剧中，还成为了保佑樱花久开不败的功臣。

敦煌文学、佛教文学是中国文化的瑰宝，也是海外中国文化研究的热点。本书从日本传衍的敦煌佛教文学入手，通过翔实的资料和严谨的透析，对敦煌佛教文学的传播和日本对之的文化接受，做出了很好的梳理和发掘，得出了有价值的结论。

■ 出版人 高伟

■ 监制 李金英

■ 选题策划 哈若蕙

■ 策划统筹 哈若蕙 杨过

■ 责任编辑 高伟 哈若蕙

■ 特约审读 吴淮生 陆平

■ 编务 李颖霞 周庆鹏

■ 装帧设计 吴海燕





◎ 人文日本新书

丛书编委会

【丛书主编】 王晓平

【顾问】

中西进 川本浩嗣 乐黛云 严绍盪 文洁若 严安生

【编委】（按姓名笔画排列）

马兴国	卞立强	王金林	王若茜	王勇	王晓平
刘立善	孙东临	陈生保	严绍盪	李征	陈德文
林少华	邱岭	胡令远	郑民钦	哈若蕙	高文汉
高宁	高伟	高慧勤			

違いの認識は異文化理解の出発点
——『人文日本新書』出版を祝して

认识差异是理解不同文化的起点

——祝贺“人文日本新书”出版

日本大手前大学校长

东京大学名誉教授 川本皓嗣

国际比较文学学会会长

在日本，以前常听到“同文同种”的说法。日本人相信自己和中国没有多少不同的地方。近代以前，那样热心地学习汉学，是因为不是把它当作中国固有的学问，而是认为它是普遍的“人”的学问。但是，其结果，就产生了一个错觉，那就是以为学习同“文”者就具有相同的世界观和价值观，直到近代以后这种错觉仍然存在。

另一方面，中国人虽然一点也不认为自己像日本人，但就像美国人多觉得加拿大像是美国的一部分或者一个“准州”似的，中国人不也觉得日本文化像是中国文化浮浅的模仿或者派生物吗？

当然，这两方面都是很大的错觉。而且，不用说，对不深知的对手却以为知之，这是极其危险的。没

壹

貳

参

肆

伍

陆

有看透相互的不同，双方都认准同样的“常识”是通用的，于是便容不得细微的龃龉，对不解的对方态度焦躁起来。

理解不同文化的第一步，就是认识相互的差异。从相互是不同的这一点出发，那么粗看起来是“不当”的“出格”的东西，实际上作为有魅力的、有启发的、至少是可以理解的人的文化的形态，正是可以如实接受的。

宁夏人民出版社不久以前出版了钱林森主编的《跨文化丛书·外国作家与中国文化》(全十卷)，在重新审视世界主要文化与中国文化的交往和相互理解方面，取得了划时期的成功。这一次又聚焦于邻国日本文化与中日关系，进而推出更大规模的王晓平主编全数十卷的“人文日本新书”。它们都是第一流的学者新写问世的最新研究成果，以深掘问题所在、精读原典、并面向一般读者好读易懂为主旨。

其中既有和歌、《万叶集》、谣曲，也有大江健三郎、村上春树、吉本芭娜娜；既有日本的敦煌文书、唐诗、《长恨歌》、《三国演义》，也有在唐留学过的高僧空海和最澄；既有东洋学与儒学，也有相扑和漫画；既有原始宗教、民间故事，也有风花雪月、恋爱和旅游，还有对不同文化间误读的研究。真可以说尽善尽美。

这套新书，辨明中国和日本的不同，无疑对于中日关系更加亲密会做出巨大的贡献。有中国方面这样的壮举于前，日本也不能不认真行事。

2004年6月



“新書人文日本”の序文

“人文日本新书”序

王晓平

数到与我国文化关系密切的别种文化，不论是说古代，还是近现代，日本文化都要算其中之一。今天，两国文化结束了以单向流动为主流的文化交流史，开始了更加频繁、更加深刻的相互作用的进程。在许多文化领域里，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小同而大异。

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可以举出很多，最简单的一点，就是两种文化的相邻关系。地球村内，比邻而居。如何看待对方，如何与对方相处，既是每天要解决的课题，又是一个解决不完的课题。因为对方在变，自己也在变。由于相邻，其共同点和相异点的效应都被放大。前者使两种文化彼此发挥着镜鉴和舟渡作用，后者使彼此的摩擦和冲撞频率倍增。

还有一点，那就是中日两国民族都有珍视人文的传统。试想，如果古代日本没有这样一点，中国文化便不会在那里产生那样巨大的影响。同样，如果中国文化没有这样一点，恐怕近代日本文化也不会带给中国文化那样多的新内容。而各自的人文，却有着不同的内涵。我们常常被两国文化的相似点和共同点所迷惑，将它夸大

柒

捌

玖

拾

拾壹

壹

拾貳

貳

而且忽视了各自原本不同的背景和文化环境。

更为重要的是，在建构现代文化的过程中，两国传统文化都正在起着重要的作用。尽管两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正越来越引起世界的关注，然而如何利用传统文化资源，以发展国际化时代的新文化，两者面临着相似的挑战，而其选择则往往大相径庭。我们正可以在这同与异的辨析之中，增长很多见识。

对于我们邻国的文化，我们需要有深度认识。

研究日本，不仅是它的政治经济，也包括它的历史传统、价值体系、社会结构、文化特征等，这种必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关于日本文化的特点，日本学者有许多阐释，例如杂种文化论、优等生文化论、换装文化论、换车文化论、日本文明论、第五种亚文化论等等。关于与中国文化的关系，日本学者也有很多说法，例如卫星文化论、非卫星文化论、先为卫星文明后为非卫星文明论、同母文化论、异母文化论等等。不可否认，这些说法有的在说明日本文化的某个侧面时曾起到过一些作用，不过它们是否都概括准确另当别论。仅靠这样的判断，能否深刻说明日本文化的传统和现代，是很值得怀疑的。日本文化在吸收外来文化的时候，又通过各种思潮的合力始终与其保持着距离。日本文化不仅历史上独自走过了漫长的路，而且今天也与我们各在一途。一句话，用我们自己的眼睛把日本文化看清楚，用我们自己的话把它说个明白，研究出深度，是我们必须要做的事情。

这种研究，首先是为了中国文化的发展。西方世界虽然对中国与日本都有不少出色的研究成果，值得我们研究与吸取，但是从总体上，没有跳出西方价值中心的

圈子，用的还是从西方文化中抽取出来的框架和概念。中国学者应该对日本研究做出自己的贡献。凝眸中国，守住本土情怀，是今天日本人文研究的生命线，而我国悠久的学术文化传统，义理、辞章、考据之学的优厚积累，则是我们能在这一领域内掘进的推动力。

同时，今天我们发展经济的大文章，是在市场日益国际化的环境下做的。发展民族文化的大文章，也要在多元文化共存的背景下做。这两篇大文章跟国家的“硬国力”和“软国力”有很大关系。不断应时而变，调整与别种文化的关系，显得格外重要。在今天，研究域外文化，已经不仅是为了实施“拿来主义”，为了“洋为中用”，因为我们不能“拿来”，或者暂时不能“拿来”，不能为我所用的，有些也需要我们去跟它打交道。做好自己的事情是在前所未有的大环境中自处和发展的基础，同时也要有更大的眼界、更敏锐的洞察力、更强的免疫力和应对能力。

从这一点出发，我们就不仅期望有“人文日本”，而且更期望有“人文印度”、“人文阿拉伯”等等。在我们不断推出自己研究成果的同时，倾听他者的声音也是必要的，这样，像“人文日本译丛”这样的选题，相信也在期待之中。来自外部的“单边主义”或者变相单边主义的压力、锁进不锁出的新“锁国心态”和内部对多元文化共存现实的“不适应征”，不会因为经济的强盛而自然消失，需要的是不懈的沟通磨合和彼此对视，这一点不论是对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其实都是一样的。

从学者个人来说，恐怕也不难感受到学术环境的变化。社会文化结构变化剧烈、雅俗界线模糊、生活节奏

加快、信息需求猛增，知识分子对非本专业知识需要的范围在扩展，而可能用于阅读的时间却在减少。学术著作，不仅需要以严整透彻的面孔登场，也需要以比较轻捷亲切的面孔，走进大众中间。在把学术书写“正”之外，再要求写短，写得耐读，就又要多下一层功夫。像日本的很多事情，在等着有人能给我们说个明白，哪怕把足够真实充分的背景材料提供给我们也好。

我们希望，收入这套丛书的每一单册，能够不炒旧饭，小题精做，拿出作者真正属于自己精心思考过的东西来，就一个日本人文题目说清楚来龙去脉。我们有心切实为文化发展做事情，就有理由相信，这套书会越出越精彩。

甲申年五月
(2004年7月)



从敦煌到日本海(代前言)

十多年前听一位福冈大学教授讲过的一句话，至今记得清楚。他说他的父亲告诉他，他家的祖上是项羽的部下，楚汉相争之后来到日本。这句话是否可靠，当然很难确考。但是，日本史书上记载有所谓“汉人”“新汉人”，他们都是很早便远渡沧波，来到东瀛，与当地入共同创造了辉煌的文化。

这几年的考古，一再把日本拥有汉字的历史往前推进，最近又发现了公元三世纪前后书写的一个“久”字。那些到日本的大陆人或者朝鲜半岛的人，也就是所谓“归化人”，通过自己的记忆或者带过来的汉字书籍，把汉字文化传过去，是很有可能。这些人当中，自然少有官僚学者，他们可能原来是渔夫、农夫、工匠或者兵士，带过去最多的，可能就是像后来的《千字文》《蒙求》这样的东西，因为这样的书，不仅自己有用，而且子孙有用，装在脑子里带过来的，恐怕也是以这样的东西为多。

后来到了遣隋使、遣唐使时代，日本人通过书籍接受中国文化发生了质的飞跃，学习中国文化成为政府行为。《旧唐书》里面说他们回去的时候，“所得锡赉，尽市文籍，泛海而还”，也就是把所得的钱币，都花来买了书。从他们的成员中有些是留学僧来看，买回的书中一定有不少是佛经与向一般民众宣传佛教的佛教文学。

有了汉字，有了书，那么也就掀开了通过语言文字展开的精神畅游的历史。在那前后日本人可能谁也没有到过印度，即使有，也会很少很少。但是却有很多人的想象，早已经横渡沧海，穿越沙漠，甚至拜谒了佛祖。不仅如此，文学世界打开的幻想天地，能使本来不存在的西方净土和天官地府，也深深影响远在日本海彼岸的人们们的精神生活和观察现实的目光。

奈良时代皇室和贵族中流行《文选》，平安时代后来又流行《白氏文集》，这些都是纯文学。不过，从唐归来的人们也带回了像《游仙窟》这样的通俗文学。他们中也有人有机会接触民众，再如果有人能像玄奘那样对不同民族的传说有兴趣的话，也会带回不见于典籍的故事。当然，这些东西都是以抄本流传的，今天学者们将之称为“唐抄本”。

民间文学、佛教文学、通俗文学，这些都是敦煌文学中特别值得注意的部分，也是奈良、平安时代抄本中最值得注意的部分。

郑阿财先生也谈到过这样的意思，他说：“唐代的敦煌的材料，它是下阶层的東西，这些东西在中国很少流传，而在我们周边的国家会流传。因为当时日本‘唐化运动’以后到中国来，留学生带走的正是民间最流行的。正像今天很多留学生来到这里学习的时候，他拿到的是当时最流行的东西，带走以后在我们这里已经不流行了，我们就看不见了。所以日本很多的书保存的就是与敦煌有关的。”（《敦煌与丝路文化学术讲座》，第一辑，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年9月）

也就是说，敦煌石窟封存的东西，在日本也有存在，过去由于它们分散在寺院、图书寮、文库以及个人手里，不大引人瞩目，处于实际上的睡眠状态。又由于近代汉字文化遭到冷遇，它们不大落入主流学术家的眼里，它们与敦煌文学固有的因缘，也就成为密封的珠宝，蒙上了历史的尘埃。

有趣的是，那些在中国被现代学者称为民间文学和通俗文学的东西，到了日本，有些地位发生了变化，因为在中国下阶层能看懂的东西，到了日本，就只有皇室贵族或者他们中学过很多汉字的人才能看懂。他们看了，还要模仿，在模仿中创造。这样原本属于中国民间文学和通俗文学的因素，就进入到日本那一时代的“纯文学”里了。像《万叶集》当中出现与《王梵志诗》相近的作品，吸收《游仙窟》构思和表现手法的作品，就说明了这个问题。中世日本的僧侣，阅读《孔子论》（即《孔子项囊相问书》），也需要较高的汉文修养。尽管在那个时代，纯文学与民间文学、通俗文学的界限不是那么分明，像敦煌文学中的有些作品，曾经给日本的作家以影响，确实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日出日落，照亮过多少越海者的冥想；潮来潮去，沸腾过多少爱书人的情思。将中日两国这些资料放在一起，中国中古文学、日本上代文学和中古文学，各自的特色显得更鲜亮，两者的关联也就更清晰。

任继愈先生说过：“敦煌学是世界范围的学术。”柴剑虹先生也说，敦煌文明是世界文明的象征。同时，敦煌文学中有些很有趣的作品，而且其中有属于我们这个民族文化精神的东西，很值得珍视。譬如尊老敬老、重视生命、看重家庭、崇尚智慧等，这些都是现代也不能缺少的。敦煌文学的发现，不仅为我们揭开了久被遗忘的文化交流史的秘密，而且它代表的不同文化相互尊重汲取的精神，也是属于现代和未来的。

日本流传的文献，不仅可以用于考证敦煌文学资料，在文献学上有独特的价值，而且是中日比较文学中需要加强研究的重要方面。

远从奈良时代起，日本作家便不断阅读中国传来的文学作品，积极吸收到自己的创作当中。其结果，日本不仅以中国刻本、抄本与所谓“和刻本”（即日本刻本）等形式，保存了大量中国文学作品（其中包括中国久已散逸的作品），而且中国文学还以被引用、被模仿、被改编（所谓“翻案”）等方式，进入到日本文学当中。在日本文学作品中的中国文学文献，或被原样保留，或被部分改变，或作了脱胎换骨的巨大改变，却都在不同程度上存续了中国文学的某些要素。从日本文学方面来说，吸收中国文学意味着表现力的拓展，而从中国文学方面来说，则使汉文学获得了在另一种文化传播与发展的机遇。

在某种意义上说，日本文学是中国文学在域外最大的资料库。

敦煌文学文献内容丰富多彩，它使中国学者对以往忽视的俗文学和佛教学术刮目相看，进而从语言、文学、宗教学等各个领域展开了深入研究。这些成果，有些便可以引入到对日本奈良、平安时代文学的研究中来。另一方面，敦煌发现的手抄本，许多虽然在我国已经失传，但在历史上却产生过相当影响，而且这种影响当时曾跨越大海，到达朝鲜半岛和日本。流传到那里的文学资料，没有因历史久远而消亡。它们以各种形式，还在传存和发展。

所谓敦煌文学，不仅仅指敦煌地区或者敦煌人创作的文学。由于唐代敦煌文化与中原文化的密切关系，敦煌还发现了许多珍贵的其他地区历代文学作品。我们今天所说的敦煌文学，就是指敦煌石室发现的那些作品。这些资料重见天日，使得中日文学交流史乃至东亚文化关系史中长期被遗忘被忽略的重要方面，有了展示于世人的可能性；同时，那些在日本传存的部分，又可以与敦煌发现的部分，相互对照，以重现它们的本来面目。

为了便于探讨，我们对那些传存在日本的敦煌文学，按照与敦煌保存的原本的距离，姑且可以划分为五级。

首先，是那些以抄本或者刻本的形式保存的本子，它们和敦煌发现的本子最为接近。例如在日本发现的《孔子论》，和敦煌的《孔子项橐相问书》出于同一系统，日本的上野本《孝子传》、李暹注《千字文注》以及《蒙求注》等，都与敦煌发现的本子颇为相近。不妨把它们看作是敦煌本子的“分身”。日本的这些抄本，很多都是在奈良时代便由遣唐留学僧或留学生带回，而后辗转传抄，它们比敦煌的本子幸运的是，历经一千多年还较好地保存了下来，有相当长的被阅读史。

第二级，是日本文学文献中引用或者引述的敦煌文学资料。自奈良时代以来，日本文学特别是佛教文学，在作品中多引用中国的故事诗文，其中便包括一些今天在中国已经失传的文学资料。例如平安时代的佛教文学总集《今昔物语集》中引述了《孔子项橐相问书》中的部分内容，中世的佛教故事集《注好选》《宝物集》等书中引述了我国失传的《孝子传》故事，在日本的文献注释书、辞书以及类书引用的典故中，也有一些与敦煌文学相关的内容。这里不排除引用者或者引述者可能对原来的材料删节或者改写的可能，但是整体上仍然较多保存着原本的面貌。我们姑且可以把它看作是敦煌文学的“影子”。

第三级，是根据敦煌文学改写（日语称为“翻案”）或创作的作品。例如《日本灵异记》中的描写鬻髅报恩的故事，便是利用了句道兴《搜神记》中的侯光侯霍故事的构思，改编成发生在日本某地的故事。据日本学者研究，奈良时代以遣唐使随员身份到过中国的《万叶集》歌人山上忆良有名

的《贫穷问答歌》，便与王梵志的诗歌《贫穷田舍汉》在情感构思乃至语言上都颇多相似处。曾在中国学习的弘法大师空海也写过《九想观诗》等作品，他的作品被有的日本学者称作“日本文化的母胎”。这些作品有的是以敦煌文学或者与敦煌文学极为相近的文学为蓝本，在题材、素材或者语言上有明显的模仿痕迹。虽然它们写的已是日本的生活和日本人的事情，但在整体上利用的还是来自中国的形式，内容上也多“复写”的部分。我们姑且可以把它们看作是敦煌文学的“化身”。

第四级，是由敦煌文学的文体发展起来的日本文学。最突出的例子是愿文。愿文在中国文学史上长期无人提及，黄征、吴伟《敦煌愿文集》的出版，才使许多人重新关注起这一文体。而在日本奈良、平安时代竟多有第一流汉学者撰写的众多作品保存下来。就是在中国这种文体被冷落之后，传入日本的这种文体也还在独自发展，甚至今天的有些法事活动中还沿用着诵读愿文的仪式。虽然某一时期其中哀伤的抒情成分被大为扩展，但在形式上还保留着古老愿文的写作原则。这些愿文由于更多显示出日本文学特色，可以看作是敦煌愿文的“亲戚”。

第五级，是敦煌文学的精神影响。这是指体现在敦煌文学中的宗教信仰和思想观念在日本文化和文学中被转化的情况。日本《风土记》逸文中记载的“天人羽衣”传说，与勾道兴《搜神记》中的“田章天女”故事属于同一类型，逸文作者将这样的民间故事记录下来，有本身来自中国的神仙思想影响在起作用，而这类故事的存在，也显示了神仙思想在民间传播有别于贵族社会的特点。到江户时代谣曲中的《羽衣》更在这个古老传说中注入了浓厚的“神佛习合”观念。另一个例子是泰山府君形象在日本的嬗变。敦煌文书中的《太山经》残卷等，说明了泰山府君信仰在六朝和唐代社会存在的普遍性，而日本阴阳师更把泰山府君作为延长万物寿命，保佑个人官职提升乃至能为国家消灾免祸的神灵，发展起来所谓“泰山府君祭”和“天曹地府祭”。这些现象的出现，已不是某一部敦煌文学作品影响的结果。与此相关的都状等文学，只能算是敦煌文学的“苗裔”。

当然，这五级文学的存在，并不限于敦煌文学。